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制度经济学研究

总第四十三辑(2014年第1期)

Research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黄少安 / 主编

个体偏好与制度的共同演化：一个新的理论探索

黄凯南

保险市场监管的博弈分析

王茂琪 陈秉正

公司治理、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

党印 鲁桐

企业出口参与决定的制度因素分析

武力超 孙浦阳 关悦

政府主导型经济：要素驱动还是创新驱动

吉云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制度经济学研究

Research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总第四十三辑 (2014 年第 1 期)

黄少安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制度经济学研究. 2014 年. 第 1 期: 总第 43 辑/
黄少安主编.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5141-4557-1

I. ①制… II. ①黄… III. ①制度经济学-文集
IV. ①F091.34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7135 号

责任编辑: 柳 敏 孙丽丽
责任校对: 隗立娜
版式设计: 齐 杰
责任印制: 李 鹏

制度经济学研究

总第四十三辑 (2014 年第 1 期)

黄少安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010-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010-88191522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jjkxcs. tmall. com](http://jjkxcs.tmall.com)

北京汉德鼎印刷厂印刷

华玉装订厂装订

787×1092 16 开 16.5 印张 300000 字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41-4557-1 定价: 33.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881915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制度经济学研究

Research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主 编	黄少安
学术委员会	(以汉语拼音为序)
黄少安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林毅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茅于軾	中国社会科学院
盛 洪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史晋川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张曙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张 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邹恒甫	中央财经大学
编辑部主任	李增刚
主办单位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目 录

个体偏好与制度的共同演化：一个新的理论探索	黄凯南 (1)
保险市场监管的博弈分析	王茂琪 陈秉正 (28)
公司治理、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地区 层面的差异	党 印 鲁 桐 (54)
企业出口参与决定的制度因素分析 ——来自微观企业的经验证据	武力超 孙蒲阳 关 悦 (82)
财政分权、行政分权改革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路 瑶 张国林 (106)
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双重任务中地方政府的 行为扭曲 ——基于多任务、两层次的动态委托代理 模型的研究	彭小静 邓 明 (125)
政府主导型经济：要素驱动还是创新驱动	吉 云 (141)
中国金融周期波动与财政政策效应	苗文龙 (161)

职业呼唤、职业承诺及职业成功

——以“985”高校女教授为例…………… 杨 术 周 杨 于桂兰 (176)

通货膨胀、价格管制与中国的食品安全

——基于“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的
案例分析…………… 罗丙能 周德翼 张国昀 王宏波 (195)

企业创新与财政支持政策

——基于企业创新能力视角…………… 郑明亮 张德升
周志刚 陈 磊 (212)

引力模型与国际贸易问题中的语言因素：一个

文献评述…………… 张卫国 陈 贝 (227)

“2013年（第十三届）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

会议综述…………… 赵 阳 苑芳凯 孙 涛 (239)

后记…………… (253)

CONTENTS

Coevolution between Individual Preferences and Institutions:	
A New Approach	Kainan HUANG (27)
Game Theory Analysis in Insurance	
Regulation	Maoqi WANG Bingzheng CHEN (53)
Corporate Governance,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Differences among Provinces	Yin DANG Tong LU (81)
Institution, Heterogeneity and Export Decision	
——Evidence from Firm-level	
Data	Lichao WU Puyang SUN Yue GUAN (105)
The Research on the Reform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n Evidence from Provincial	
Panel Data	Yao LU Guolin ZHANG (124)
The Game between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s	
about Double Target of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Xiaojing PENG Ming DENG (140)
Government-led Economy: Factors Driven or	
Innovation Driven	Yun JI (160)
The Financial Cycle of China and the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	Wenlong MIAO (175)

- Research on Career Calling, Career Commitment and Career Success:
Taking the “985” College Female Professors
as an Example **Shu YANG Yang ZHOU Guilan YU** (194)
- Inflation, Price Control and Food Safety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Melamine-tainted
Milk” **Bingneng LUO Deyi ZHOU**
Guoyun ZHANG Hongbo WANG (211)
- Enterprise Innovation and the Financial Support Policy –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Angle of Innovation
Capability **Mingliang ZHENG Desheng ZHANG**
Zhigang ZHOU Lei CHEN (226)
- Gravity Model and Language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 Review **Weiguo ZHANG Bei CHEN** (238)

个体偏好与制度的共同演化： 一个新的理论探索*

黄凯南**

【摘 要】当前对个体偏好与制度的共同演化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研究更多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和归纳上，尚未能够深入探讨偏好与制度的互动关系，进而也未能深入剖析两者的共同演化机制。本文尝试进一步探索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在重新考察偏好和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剖析偏好演化机制和制度演化机制，较为深入地分析偏好与制度的共同演化机制，在此基础上，运用一个简要的演化模型来描述偏好与制度共同演化的逻辑关系，最后进一步展望该理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偏好 制度 共同演化

中图分类号：F06 文献标识码：A

一、引 言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个体偏好和制度都是外生给定的，经济学家主要关注既定偏好和制度下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①。随着

* 本研究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项目（NCET-11-0302）、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ZR2010GQ007）、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12RWZD11）等的资助。

** 黄凯南，经济学博士，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地址：（250100）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E-mail: kennen@126.com。

① 当然，在经济学说史上，并非所有的经济理论都将个体偏好和制度视为外生。最为典型的例外是以凡勃伦、康芒斯、米切尔和艾尔斯等为代表的旧制度学派，该学派长期关注个体偏好（如本能和习惯）和制度问题，并且在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成为流行的研究范式。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一般均衡理论、计量经济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发展，新古典经济学在形式逻辑和经验研究上都大大超越了旧制度学派，并迅速成为主流的研究范式，个体偏好和制度也被视为外生给定的变量而不予研究（如霍奇逊，2007；黄凯南和黄少安，2009）。

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制度逐渐纳入主流经济学的解释范畴 (Joskow, 2008)。当前,比较流行的将制度内生化的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新制度经济学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基础上,放松了“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建立了制度与交易费用的关联,通过比较交易费用的大小,将制度内生于个体的理性选择中。并且,随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将完全理性选择拓展到有限理性选择 (Coase, 1937; Williamson, 1975, 1985; Libecap, 1989; North, 1990)。其二,随着博弈论的发展,制度被视为一种博弈的均衡结果而内生于参与者的策略互动中 (Schotter, 1981; Aoki, 2001, 2007; Grief, 2006)。制度的博弈论分析既包含遵循完全理性假设的经典博弈论分析 (Grief, 2006; Binmore, 2009),也包含遵循有限理性假设的演化博弈论分析 (Young, 1998, 2007; 黄凯南, 2009)。其三,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借助博弈论和社会选择理论,机制设计理论将制度视为一种博弈形式 (game form) 内生于参与者的理性设计中。无论是完全合同理论中的最优合同设计,还是不完全合同理论中的最优产权结构设计都体现了机制设计理论的思想 (Jensen & Meckling, 1976; Grossman & Hart, 1986; Hart & Moore, 1990, 1999, 2008; 博尔顿和德瓦特里庞, 2008)。机制设计理论也是当前主流的制度理论。实际上,上述这些制度内生化的研究在本质上都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学“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仅仅从个体选择或博弈的视角来解释制度的生成与变迁,而没有考虑制度本身对个体偏好生成和变化的塑造和影响。尽管这种分析方法有助于我们了解个体的微观动机是如何推动制度的生成和变迁的,但是,由于缺少对于这些微观动机的形成和变化的解释,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这种单一维度的研究很难解释大量复杂的社会经济变迁现象,并且在方法论上容易陷入还原主义的窠臼 (North, 2005; Hodgson, 2007a, 2007b, 2010)。

关于偏好问题的研究长期受到经济学的忽视,它通常被认为是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的研究领域。针对众多偏好变化的现象,许多主流经济学家都接受了加里·贝克尔 (Gary Becker, 1992) 的观点,认为可以通过构造一个包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变化的元偏好 (metapreference) 函数或者扩展的效用函数,将许多看似变化的偏好 (被称为次偏好) 纳入元偏好稳定的解释体系中^①。因此,在贝克尔看来,基于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模型依旧适合于解释许多次偏好或口味变化的现象。例如,个体通过控制未来人力资本的存量可以理性地选择其未来的次偏好。这种次偏好的内生化实际上是通过构建一个更加复杂的超级理性选择模型来实现的。尽管如此,贝克尔

^① 例如,元偏好是稳定的,所谓偏好的变化是次偏好的变化,它主要是由于参与者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存量的变化引起的。

本人也不反对发展其他更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来解释偏好变化现象（贝克尔，2000）。近些年来，随着脑科学、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和演化心理学等认知科学与经济学的紧密结合^①，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尝试打开个体决策行为的黑箱，抛弃新古典经济学“偏好外生给定”的假设，重视对偏好形成和变化的研究（Kahneman, 2003; Damúsio, 2005; Lichtenstein & Slovic, 2006; Martins, 2008）。同样地，更多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考察制度对个体行为约束的影响，而是更加重视制度对个体偏好本身的影响（Bowles, 1998, 2008, 2009a; Hodgson & Knudsen, 2004; North, 2005; Witt, 2005; Carlos, Ricardo & Juan, 2006; Alberto & Nicola, 2007）。Hodgson (2007b, 2010) 将此研究方法称为“向下因果关系”（Downward Causation），有别于“向上因果关系”（Upward Causation），后者是指仅仅从个体的视角来研究个体与制度的因果关系。但是，同样地，仅仅从此单一维度考察制度对个体偏好的影响容易被贴上集体主义方法论的标签，进而被视为制度或文化决定论。

霍奇逊（Hodgson, 2007a）指出，在本体论层面上，个体和制度是共生存在的，它们构成了经济研究的二重本体，经济学的方法论必须突破纯粹的“个体主义”以及纯粹的“集体主义”（或“制度主义”），而转向“个体与制度的互动主义”。近年来，如何从两个维度互动的视角来内生地解释个体偏好与制度的生成和变化是当前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前沿（North, 2005; Hodgson, 2007b; Binder, 2008; Hodgson & Huang, 2011）。随着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复兴，共同演化理论为解释多层次互动的复杂系统演化提供良好的分析视角（Volberda & Lewin, 2003; Jouhtio, 2006; Silva & Teixeira, 2009; 黄凯南, 2008, 2010b）。一些学者也开始尝试从共同演化的视角来分析个体偏好与制度的内生互动关系（Van den Bergh & Stagl, 2003; Bowles, Choi & Hopfensitz, 2003; Hodgson & Knudsen, 2004; Binder, 2008; Bowles, 2004, 2009）。但是，当前对个体偏好与制度的共同演化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研究更多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和归纳上，尚未能够深入探讨偏好与制度的互动关系，进而也未能深入剖析两种的共同演化机制（Bergh & Stagl, 2003; Binder, 2008）。还有为数不多的模型研究主要是运用基于智能体的模型（Agent-based Model）或简单的演化博弈模型（如复制者动态模型）来仿真偏好与制度的共同演化过程，也缺乏对其共同演化机制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Bowles, Choi & Hopfensitz, 2003; Hodgson & Knudsen, 2004; Bowles, 2004, 2009）。

^① 这种结合产生了许多基于认知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例如，行为经济学、神经元经济学、心智经济学（economics of mind）和跨学科综合学派等（参见黄凯南和程臻宇，2008）。

本文尝试进一步探索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在重新考察偏好和制度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深入剖析偏好演化机制和制度演化机制,进而构建两者的共同演化机制。论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重新考察偏好和制度的概念;第三部分在探讨偏好演化和制度演化的基础上,构建偏好与制度共同演化的机制;第四部分尝试运用一个简要的模型来描述偏好与制度共同演化的逻辑关系;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与未来研究的展望。

二、偏好和制度的再考察

(一) 偏好的再考察

1. 主流偏好理论遇到的挑战

在许多学科中^①,偏好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并且不同学科对偏好的定义也不相同。在当前的主流经济学中,偏好通常被定义为一套逻辑严密的排序体系,它满足完备性、反省性、传递性、连续性、局部非厌足性(locally non-satiation)、单调性和凸性等逻辑性质。通过在偏好关系上构建效用函数,并将最大化效用函数作为个体选择的行为模式,新古典经济学建立了偏好与行为的数理逻辑关系,创建了理性选择的研究范式。而且,在显示性偏好理论的推动下,偏好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可逆的,这使得新古典经济学似乎克服了主观偏好难以客观描述的问题。进一步,在冯·纽曼和摩根斯坦的推动下,期望效用理论将理性选择运用到不确定性的行为决策中。基于上述偏好性质的理性选择理论不仅仅在经济学中广泛运用,还被广泛运用到现代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和法学等社会科学中,一度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范式(Hedström & Stern, 2008)。

但是,随着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和神经元经济学等的兴起和发展,大量研究发现,个体偏好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满足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逻辑性质。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个体偏好存在系统性的背离上述逻辑性质,存在诸如“偏好逆转”(preference reversals)、“锚固效应”(anchor effect)、“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现状偏见”(status quo bias)、“镜像效应”(reflection effect)和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s)等现象(Kahneman & Tversky, 1979; Tversky & Kahneman, 1986, 1991; Kahneman, 2003)。在实验经济学方面,“最后通牒博弈”的跨文化

^① 例如,经济学、社会学、道德哲学、政治学、心理学、法学和社会生物学等。

实验研究发现, 个体的偏好并不是孤立的逻辑体系, 而是受到社会文化制度的系统性影响和塑造 (Henrich, 2000; Henrich & Boyd & Bowles, 2001; Henrich, 2003); “公共物品自愿供给” 实验研究表明, 个体不仅拥有利己偏好, 还拥有大量包含公平、正义、道德、规范等内在价值的社会性偏好 (social preferences), 这些偏好都受到制度的影响, 并且它们在许多情况下都不是独立的, 一些显性、外在的激励机制在激励利他偏好的同时, 可能会损害社会性偏好, 造成挤出效应 (crowding out), 进而在总体上降低公共物品的自愿供给水平 (Bowles, 2008; Bowles & Hwang, 2008; Ingela & Weibull, 2010)。此外, 还有一些研究表明, 在许多情况下, 个体偏好并不是外生给定不变的, 而是内生于个体的行为选择或决策过程中的, 偏好在被引出的过程中 (process of elicitation) 也同时被内生地构建 (Lichtenstein & Slovic, 2006)。而且, 偏好的改变或构建也会发生在许多无意识的行为过程中 (Coppin & Delplanque et al., 2010)。近年来, 一些由心理学家提出的有关内生偏好和偏好变化的命题也被大量的脑科学研究所证实, 有关偏好形成和变化的认知特征的研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① (Schkade & Johnson, 2006; Sharot, De Martino and Dolan, 2009)。

当前, 经济学的许多前沿基础理论研究都在试图放松和超越新古典经济学对偏好的数理化定义, 结合其他学科的研究进展, 越来越重视对个体偏好实质内涵的研究, 进而构建各种基于有限理性的个体行为决策模型 (Gigerenzer & Selten, 2002; Brenner, 2006)。正如完全理性的行为模型只有效用最大化一种, 而有限理性的行为模型却具有无穷多种, 因而很难为后者构建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基准模型, 同样地, 一旦放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偏好假设, 我们也很难给出一个统一并具有普适性或一般性的偏好定义, 因为拥有不同认知模式的个体可能具有不同的偏好特征^②。

2. 偏好的四个维度

从广义上讲, 偏好可以被认为是用来解释个体行为产生的原因, 它包括个体的一系列诸如生理、文化和心理等特征, 这些特征能够用来解释个体在特定的场景中所采取的行动 (Bowles, 1998, 2004; Binder, 2008)。偏好不仅包括新古典经济学所主张的享乐主义效用, 还包括各种由基因遗传的本

^① 例如, Sharot, De Martino and Dolan (2009) 研究表明, 当个体在原先两个价值相近的选项做出选择后, 个体会改变对原先两个选项的偏好, 会赋予被选择对象更高的价值。这种偏好的变化也反映在生理上的变化, 即有关预期效用刺激及其情感反应之间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通过磁共振成像技术在尾状核区位观测得到, 具体表现为血氧水平独立信号在被选择对象和淘汰对象之间的差异在选择后得到很大的强化。

^② 这种缺乏一般形式化的困境也是许多新兴的经济理论至今无法取代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重要原因, 后者在一般形式化上太过于完美了。

能、个体心理倾向、内化的社会道德、价值和习惯等 (Arthur & North, 1993; Bowles, 1998; Gintis, 2003, 2007; North, 2005; Hodgson, 2010)。因此, 偏好不仅包括享乐主义的心理偏好, 还包括各种生理偏好、社会和文化偏好等。

从偏好形成的视角, 可以不严格地用以下四个维度来阐释偏好的内涵: 其一是生物演化的维度, 即人类作为物种在漫长的自然选择中演化形成的各种基本偏好。对于个体而言, 这些偏好是先天存在并由基因传递的 (如各种本能的行为倾向)。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因遗传学和演化生物学等领域 (Robson, 2002; Damásio, 2005; Martins, 2008)。其二是基因与文化协同演化的维度, 即个体某些偏好是在基因与文化协同演化过程中形成的 (Bergh & Stiglitz, 2003; Cochran & Harpending, 2009)。对于个体而言, 这些偏好也是先天存在并由基因传递的。但是, 较之于前一类偏好, 这种偏好还受到早期人类文化制度的影响^①, 具体表现为许多社会性的本能 (如一些公平、互惠和利他的偏好以及对社会地位和权力的偏好等), 它们几乎在更新世晚期已经形成了 (Kock, 2010)。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生物学、演化心理学、生物经济学、群体选择理论和双重遗传理论 (Dual inheritance) 等领域 (Wilson & Sober, 1994, 1998; Richerson & Boyd, 2005)。其三是社会文化制度维度, 即个体的某些偏好受到社会文化制度的塑造。这种社会文化制度既包括习俗、惯例、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 也包括政治体制、宪政和法律等正式制度, 它们系统地影响了个体的价值观和社会态度 (Henrich, 2003; Alesina & Fuchs-Schündeln, 2007; Binder, 2008; Bowles, 2004, 2009)。尽管流行的偏好可能在个体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但是, 对于个体而言, 这些偏好并非由基因传递的, 而是由文化传递的, 它们是个体在后天的社会互动过程中学习获得的。Gintis (2003) 归纳了三种类型的文化传递模型: 垂直传递 (从父母到儿女)、倾斜传递 (通过包括世俗、宗教仪式、学校和传播媒体的社会制度) 和水平传递 (同辈之间)。其四是个体认知心理维度。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大量研究表明, 在许多情况下, 个体的偏好受到个体认知心理状态的影响^② (Tversky & Kahneman, 1986; Kahneman, 2003)。这种类型的偏好既不是由基因传递, 也不是由文化传递, 通常是由个体学习获得的, 个人经历会直接影响此类偏好 (如个人独特的口味)。随着个体信息和知识的更新, 这种类型的偏好会发生变化。

① 例如, 人类采集和狩猎时期的平均主义制度。

② 例如, Tversky & Kahneman (1991) 指出, 无论是价值函数还是概率函数, 都受到个体认知心理状态的影响; 价值函数具有“基点依赖” (reference dependence)、“损失厌恶” (loss aversion)、“敏感度逐渐缩小” (diminishing sensitivity) 等特征, 而概率函数则具有“次确定性” (subcertainty) 和“次比例性” (subproportionality) 等特征。

通常来讲,在上述四种维度中,偏好的稳定程度依次递减。生物演化维度的偏好是最为稳定的^①,反之,个体认知心理维度的偏好则是最容易发生变化的。第一种和第二种维度的偏好是人类共同拥有的,它体现了人类的同质性。第三种维度的偏好是拥有相同社会文化制度的人们共同拥有的,它体现了同一文化群体中个体间的同质性,以及不同文化群体中个体间的异质性。第四种维度的偏好则凸显了个体的独特性和异质性。但是,必须注意,对于这四种维度的区分仅仅是为了理论阐述的便利,它们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相互影响。例如,个体认知心理维度既受到生物演化维度的影响,也受到基因与文化协同演化维度以及社会文化维度的影响。这四种维度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共同作用于个体,塑造了个体的具体偏好。个体后天形成的偏好既受到先天基因遗传的影响,也受到文化传递的影响,以及个体自身认知心理的影响。至今为止,人类对于这四个维度相互关系的了解还相当匮乏,这方面知识的改善还有待各种相关学科的发展和融合。

(二) 制度的再考察

1. 博弈论视角下的制度与局限

当前,有关制度的定义众多,尚未形成一个广泛共识的制度定义^②。但是,随着博弈论被广泛地运用到制度分析中,越来越多的研究尝试从博弈论的视角来阐释制度(Schotter, 1981; North, 1990; Grief, 1993, 2006; Hurwicz, 1993; Aoki, 2001; Binmore, 2009)。制度通常被视为博弈的规则(North, 1990; Hurwicz, 1993; Weingast, 1997)、博弈的参与者(Penard, 2008)或者博弈的均衡结果(Aoki, 2001, 2007)。制度的博弈规则观是将制度视为博弈的外生规则,它是所有参与者事前必须共同遵循的规则,是参与者之间有关博弈场景的共同知识。这方面的研究集中在机制设计理论中。但是,如果将制度视为博弈规则,对于制度的实施和生成只能诉诸于一个更高层级的博弈(meta-game),而后者博弈规则的生成和实施又必须再次诉诸于更高层级的博弈,如此递推直至无穷,很难真正回答制度生成问题(Aoki, 2001)。制度的博弈参与者观实际上是将制度视为一个特殊的参与者,通过引入这个参与者(例如,政府),能够改变其他参与者的策略集合、支付集合、信息集和博弈的次序等,亦即能够改变原有博弈的外生规则,这实际上是形成新的博弈规则(Penard, 2008)。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博弈参

① 当然,也不能排除基因变异的可能性,这会导致偏好的变化。

② 霍奇逊(Hodgson, 2006)指出,由于很难得到一个广泛接受的制度定义,许多研究都不再关注制度定义问题,而是转向研究更为具体的制度问题。

与者观实际上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博弈规则观。许多学者也明确反对将制度视为博弈的参与者^①。制度的博弈均衡观是将制度视为一种内生于博弈过程的均衡结果,既包括博弈策略均衡结果,也包括有关博弈如何进行或如何达到某一具体策略均衡的共有信念^②(Schotter, 1981; Aoki, 2001, 2007; Grief, 2006)。这种制度均衡的实现既可能是源自经典博弈论的重复博弈,也可能源自演化博弈论的动态演进过程。Grief (2006) 尝试整合上述三种制度观,给出一个更为综合的制度概念,将制度定义为由规则、信念、习俗和组织等组成的系统,它能够形成有规律的社会行为。但是,由于 Grief 没有在学习上深入阐释这种制度系统是如何构成的,他的制度观显得比较繁杂,更多停留在对各种制度类型的罗列 (Badun, 2009)。

尽管博弈论能够为我们理解制度的内涵提供有益的洞见,但是,博弈论却还存在固有的局限。无论是经典博弈论还是演化博弈论,博弈规则都是外生给定的,这意味着当前流行的制度博弈分析都是基于某种外生给定的制度(即博弈规则),参与者都是这种外生制度的接受者,并不会对这种外生制度产生影响,该理论也不能解释这种外生制度,亦即制度是独立于该理论的解释体系(黄凯南, 2009)。因此,当前流行的博弈论(包括经典博弈论和演化博弈论)并不能彻底解释制度生成和演变等问题。此外,由于仅仅从个体的视角研究制度,偏好被视为外生给定,博弈论完全忽略了制度对个体偏好的影响 (Hodgson, 2007b)。因此,从博弈论的视角来阐释制度还存在一定的局限。

2. 参与者互动视角下的制度

为了摆脱博弈论的困境,这里从参与者互动的视角来阐释制度。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它指两个或多个参与主体之间的行动存在直接或间接的相互影响关系,它既包括经典博弈论所描述的策略博弈,也包括演化博弈论所描述的策略学习,还包括其他并非博弈论所描述的各种社会互动^③。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不是在外生给定的互动规则下进行的,所有的规则都是内生于参与者的互动之中,而这种互动规则一旦形成了,对于某个具体的参与者而言,它便构成了他与其他参与者互动的规则,但是,这种规则不是给定不变的,随着互动场景的变化和参与者认知的变化,这种规则会进一步演化。例如,在某些互动场景中,参与者之间可能不拥有有关互

① 例如,诺思 (North, 1990) 区分了制度和组织,认为组织不是制度,它是博弈的参与者,而制度是博弈的规则。

② 由于博弈存在多重均衡,仅仅依靠原有博弈规则并不能预测具体的博弈结果,制度作为一种内生于博弈的制度化规则 (institutionalized rules) 或者达到某一均衡策略的共有信念,能够指导参与者采用某一均衡策略,从而降低博弈的不确定性,以解决参与者之间的策略协调问题。

③ 例如,日常的社会交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等。

动场景的共同知识，参与者凭借各自的主观认知模型来理解和解释互动场景，随着互动的展开^①，参与者之间可能形成共同的主观认知模型，这便构成了参与者之间的互动规则，这种共同的主观认知模型又会进一步强化和塑造个体的偏好和认知，并且随着参与者自身主观认知模型的变化，作为共同认知模型的互动规则也可能发生变化（黄凯南，2010a）。因此，从互动的视角能够内生地解释互动规则的生成和演变^②。此外，由于这种互动不仅发生在个体之间，还发生在个体与群体或个体与制度之间，因此，它也考虑了个体偏好与制度的相互影响关系。

制度可以被定义为参与者之间互动形成的规则系统，而这种规则系统一旦形成又会进一步协调、组织和约束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从而降低互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Hodgson, 2006, 2010）。作为互动规则系统的制度包含以下几个层面的规则：其一是行为层面的规则，即共同遵循的行为规则，它刻画了参与者之间的行为均衡，是可以观察的层面。其二是信念层面的规则，即共享信念（shared belief）（Aoki, 2001, 2009），它描述了参与者之间对互动场景的状态不确定性的共享信念。当存在多种可能的互动结果时，它描述了参与者之间有关达至某一具体结果的共同信念，刻画了参与者之间的信念均衡。其三是价值层面的规则，即参与者之间拥有的共享价值观，描述了参与者之间对行动意义和重要性拥有共同的评判标准，它通常塑造了参与者的行为动机。其四是认知结构层面的规则，即参与者之间对互动场景的共同认知模式或共享心智模型（shared mental model）（Arthur & North, 1993; North, 2005）。它是指参与者之间对互动场景的信息拥有共同的信息加工和处理模式（即共同的信息结构），包括共同的信息编码规则、抽象规则和解码规则（布瓦索，2003），刻画了参与者之间认知模式的均衡。它使得参与者之间能够运用相同的心智模型来感知和解释其所处的互动场景。在这四种规则中，除了行为规则外，其他层面的规则都是很难被直接观察，但是，其他层面的规则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作用在行为规则上，并且会影响行为规则的稳定性。

上述四种类型的规则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一个包含行动规则、共享信念、共享价值和共享心智模型等在内的规则系统。这种规则系统会影响和塑造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模式、互动过程以及互动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讲，制度实际上很难被明确地区分为正式和非正式（North, 1990），任何制度都是包含所谓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规则系统。

① 这时候的互动就不能用博弈论来描述，因为不存在外生的博弈规则。

② 有些学者将这种互动称为主观博弈（subjective games）或者归纳博弈（inductive games）（如 Kaneko & Kline, 2008; 黄凯南，2010）